



社會學伴三十年：前思與後想

蔡明璋*



一、初登講臺

在 1986 年 9 月初從軍中退役後的隔天，我就到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系任教。在那個時代，我的臺大碩士學位，讓我有機會當個講師。教了三年，感覺到在學界工作，是需要個博士頭銜，又看到當時一些回國的新科博士所寫的論文，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困難，遂計畫前往美國。當時的國科會，仍撥經費支持大學講師到國外修讀博士學位。我的申請獲得通過，1989 年秋進入紐約州立大學石溪校區的社會系博士班就讀，1992 年秋完成學位回到原校。光陰匆匆，這一段學術生涯，到今年已經三十年了。

回想起初登講臺這段時間，本事不多，不論是教書或寫研究論文，僅有一招半式，仍是生手。在課堂上，將前一、兩天備課的內容，講給大學生聽，使用美國大學的教科書，效果不是很好。不過，因為講課的關係（只是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講，使用英文教材的緣故，學生有反應的不多)，要充分的準備，教材需搞的很清楚，反而因此廣泛閱讀了各式各樣的專論與教科書。這些不一定是與自己的研究議題直接有關，長久下來，實則自己受益多於學生。

這時也開始試者將博士論文及相關的研究在國際期刊上投稿，前幾年其實是很慘痛的經驗，稿件寄到所謂的「國際知名」期刊，評審幾乎沒有給過任何正面的評價。我曾想找以前的指導教授 Ian Roxborough 合作，他認為我應自己多嘗試、摸索，所以也就作罷，回想來也確是如此才能在不斷試煉中成長。

二、忽有靈光

正當為學術研究沒有進步而感到苦悶時，約在 1995 年前後，因備課需要，我「再次」閱讀 Mark Granovetter 教授於 1985 年出版的一篇經典名著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其實我到 Stony Brook 大學時，他是系主任，看到我這個國外來的新學生，興沖沖的帶我到他的研究室，將這論文的「原版」抽印本給我，並介紹他這篇文章。當時不知這是他的傳世之作，其實讀的也不甚懂，又與我的博論主題不同，遂擱在一邊。再次閱讀時，用心細嚼，以便說給學生了解。當時心中靈光一閃，才知社會科學的竅門，實在於理論概念的創造，用之以理解，掌握萬般紛擾中的世界結構。重點不是記住他文章中那些概念（例如：*over-socialized theory*、*under-socialized theory* 或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是什麼意思，而是為何他想的出來，而我沒有這麼想？

其實，回想起來，我也從來沒有用這樣的方式思考過。創造一個全新的概念來掌握面對的社會世界，的確不是以往在學校教育中會有人教的。以前的教育，習慣上要求學生背誦，套用「成語」湊成一篇文章（至少我這一代的教育模式是這樣的，不過現在已經有所改善了）。這樣的教法多是在規訓學生的腦袋，難以成就創意。使用我們熟悉的中文來鑄合、創造新詞概念，已經頗困難的了，更何況使用外語做這件事？不過，一旦掌握這個「關鍵化技術」，事實上做研究不但不難，反而成了一件有趣、可以自我挑戰的事。

三、學用相連

也因為年過四十後，感覺到研究創作不再那麼困難，所以也就更投入，



結果是有點忘了外在社會的存在。大部分社會科學研究者，對社會的了解是很充分，但寫出很多引用次數不多的論文，對社會的具體貢獻很少——至少我太太是這麼說我的。這個說法也不是很有道理。社會科學家平時專注研究，累積知識，可以比喻是在十八銅人陣中練習對打（包括面對匿名但不知其所在的審查人），將習得的十八般武藝，各式兵器，三不五時拿來演練一番。同時，也藉這樣的機會，學習新奇招數，下次演練時再試看看工夫有無長進。

然而社會科學家真正的「實戰」舞臺，其實是政策倡議甚或政策實踐。前者是參與公共領域，就特定想法或政策大力倡導，後者則是成為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是政策的執行者。一旦有機會在這兩個舞臺提供所知，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機緣。不過，實際的政策運作所需的細部規則，常不是學界研究者所熟悉的。一般性的學理想派不上用場，常是因為現有的法律規則、官僚習性、特定利益或社會既有的價值立場，容不下高遠、另類的理想。儘管如此，有志者還是要選擇一個與研究相近的領域，隨時注意相關政策的發展，做個有備而來的知識分子。一些法律、經濟與社會福利學界的朋友，他們的研究很貼近特定領域和政策，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也因此很立即，也很有力。

在民主社會中，法律的創造與運作是極其關鍵的。而法律的建構，不能是由少數政治精英所控制。社會科學家要參與公共事務，對政策與官僚運作也要相當熟悉，說是別有深情，看作是學術研究的自然延伸，亦不為過。

四、南港新頁

2014年夏，我從三峽的臺北大學轉職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意外的開啟學術生涯的一段新旅程。空出許多備課時間，對一個時間永遠不夠用的研究者來說，是相當可貴的。在中研院參與了更多的學術研究與規劃活動，是理所應為的公共服務。同時我也在思考，有一些更為重要的任務應擺在更前面，這個階段不應再算每年發表了幾篇論文，這已是次要的了。最後這十年不到的時間，得想想能為臺灣的社會學界建構一些重要的基礎。這一頁人生，我自己看來是全新的，有無限開放的可能。